

论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建设背景下的嘉兴经济发展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对接视角¹

李 萍¹、刘永泉²

(1. 嘉兴学院 商学院; 2.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外贸分院, 浙江 嘉兴 314000)

【摘 要】：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对接的视角，对比分析其代表城市上海、苏州、嘉兴的经济情况，提出了拓展的“中心-外围”理论，对三个城市样本在 1990-2015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嘉兴经济发展的对策：在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建设背景下，嘉兴应以产业接轨上海为核心，抓住上海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的机遇，努力使嘉兴经济社会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关键词】：浙江；上海；拓展的中心外围；城市群；产业对接

【中图分类号】：F127.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 (2018) 03-0051-06

上海市努力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的中心，给周边城市提供了对接机遇。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高、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其人口密集，经济和城市发展水平较高，发展相对均衡，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发展走向至关重要。作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的示范区，嘉兴正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合作与交流，率先打造浙江与上海创新政策的接轨地。如何合理布局长三角城市群间的价值链分工和产业分工，充分获得综合发展的利益是目前嘉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外关于城市群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围绕“中心-外围”理论展开。该理论最初被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后来被运用到分析城市群中城市分工和产业分工。如：Krugman 利用垄断竞争模型，构建了“中心-外围”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1]Krugman、Elizondo 认为，经济地理模型中必须考虑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关系与作用；^[2]Overman、Ioannides 强调，产业集聚和离散在城市体系中起决定作用；^[3]Partridge et al 研究表明，“中心-外围”理论将向心力和离心力动态运用于城市群的系统层级关系中。^[4]二是围绕城市群及城市的分工进行研究，如对城市及城市体系的研究，而利用美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总部有迁移到中心城市的倾向。^[5]

国内对城市群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利用“中心-外围”理论研究城市分工和专业化、城市群空间以及对对中国城市群对比等方面的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 16 个核心城市的实证分析表明，发挥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蒂伯特选择”机制的用脚投票功能，有助于形成合理地域分工和专业化。^[6]而基于协同理论，分析长三角区域 22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分为上海核心圈、南京核心圈和杭州核心圈，多中心城市格局是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趋势。^[7]长三角城

¹**【收稿日期】**：2018-03-22

【作者简介】：李萍（1980-），女，安徽萧县人，嘉兴学院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刘永泉（197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贸分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

网络出版时间：2018-05-03 10:40:48

网络出版地址：<http://lc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80428.1645.010.html>

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服务-生产”职能分工有增强趋势，且城市功能专业化促进城市经济增长。^[8]另外，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比较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以及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产业联系度越强，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且中心城市与邻近外围城市产业联系弱化是造成“大都市阴影区”的主要原因。^[9]而长三角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在下降，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溢出、空间依赖对城市极化效应均有显著影响。^[10]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一员，嘉兴欲接轨上海，主要应包括产业、基础设施、人才、科技创新、平台、公共服务、人才、政策、理念等方面的接轨，其中产业接轨是核心。本文拟从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嘉兴如何建设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

一、长三角代表城市的对比分析

选取嘉兴、上海、苏州这三个长三角区域的代表城市作为研究长三角城市产业分工的样本。嘉兴在 1992 年就提出要接轨上海，2004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嘉兴调研时也强调：“嘉兴作为浙江省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要在全省‘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①嘉兴位于上海南翼，2016 年 GDP 为 3760.12 亿元，工业经济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化纤、皮革等传统产业。苏州位于上海北翼，2016 年 GDP 达 15475 亿元，在全国排名前五。^②

虽然嘉兴早在 1992 年就提出对接上海的口号，但发展却远不如苏州。苏州迅速瞄准上海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的机遇，把握上海经济发展、城市转型过程的产业、资本、人才等资源外溢机会，对接上海承接产业资源要素转移；同时，苏州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开放经济。在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苏州实现了经济腾飞。表 1 是嘉兴、上海、苏州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1990 年，嘉兴 GDP 为 81.33 亿元、苏州 GDP 为 202.14 亿元，苏州是嘉兴的 2.48 倍；到 2015 年，嘉兴 GDP 为 3517.8 亿元，苏州 GDP 为 14504 亿元，苏州是嘉兴的 4.12 倍。2016 年苏州 GDP 在全国城市排名中已进前五，而嘉兴依然在中等规模城市徘徊。从经济结构来看，苏州产业结构也明显优于嘉兴：嘉兴的产业结构仍然为传统的工业结构，其规模排序为工业、第三产业、农业；而苏州的产业结构已经升级发展，其规模排序变为第三产业、工业、农业。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苏州也将嘉兴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从开放经济视角来看，不论外资依存度还是外资规模嘉兴也都远落后于苏州。

表 1 嘉兴、上海、苏州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①

城市	年份	GDP/亿元	工业/亿元	三产/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进出口/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嘉兴	1990	81.33	34.82	15.8	24.25	0.384	0.384	0.013
	2005	1158.38	608.24	392.61	703.46	99.22	70.44	11.56
	2010	2315.46	1190.48	851.3	1488.27	228.24	160.4	16.1
	2015	3517.81	1668.57	1528.04	2513.82	310.85	229.27	26.84
上海	1990	781.66	469.83	241.82	227.08	74.31	53.21	1.77
	2005	9247.66	4129.54	4620.92	3542.55	1863.65	907.42	68.5
	2010	17165.98	6536.21	9833.51	5317.67	3688.69	1807.84	111.21
	2015	25123.45	7162.33	17022.63	6352.7	4517.33	1969.69	184.59
苏州	1990	202.14	112.59	43.9	55.37	1.88	1.55	0.7
	2005	4026.5	2520.6	279.06	1233.76	1405.9	727.7	5.11
	2010	9228.9	4909.78	3834.3	3617.8	2740.76	1531.08	85.35

^①<http://jiaxirig.iejue.com/news/2017-04-05/104662552188505358%857.shtml>.

^②数据来源：《苏州统计年鉴》《嘉兴统计年鉴》。

	2015	14504.1	6497.82	7143.2	6124.43	3053.5	1814.6	70.19
--	------	---------	---------	--------	---------	--------	--------	-------

备注：由于不同地区选取的统计指标存在差异：苏州仅报告了“工业总产值”，故苏州的“工业”数值

嘉兴与上海的差距更是巨大。以 2015 年的数据为例：上海的 GDP 是嘉兴的 7.14 倍；上海的第三产业占到 GDP 的六成以上，嘉兴该比重仅为四成多；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上海是嘉兴的 2.53 倍；上海的进出口总额是嘉兴的 14.5 倍，其中出口额是 8.6 倍。虽然嘉兴的产业基础较好，近年来已经实现了传统制造业升级，通过优化产业目录、腾退低效空间等方式进行转型提升，成效显著；但在产业结构方面仍有待提高，如：经济结构偏重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尤其是智能服务业比重较低。目前，嘉兴市将发展装备制造产业作为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装备制造企业产品主要涵盖精密机械、光伏电站装备、成套装备、汽车零部件、通信装备等领域。

通过三个城市的对比可以看出：上海、苏州、嘉兴不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在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呈现“阶梯状”，即上海位于最顶端、苏州紧随其后，而嘉兴则相对落后。这也验证了城市分工的国际经验：中心城市侧重从事服务性的研发、设计、管理、咨询职能，位于价值链的高端；而外围城市多从事生产性职能，位于价值链的低端。

二、拓展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

“中心-外围”理论最初被用于解释宗主国与其殖民地（或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上核心和附属地位。雁行理论（Flying Gees Model）的内容是：东亚经济以日本为领头雁，日本最先发展某一产业，随着该产业在日本的竞争力转弱，该产业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区域；亚洲四小龙在该产业发展成熟后再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样，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间形成一种有先后顺序的产业结构升级。

在“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利用“雁行理论”进行拓展，发展为“拓展的‘中心-外围’理论”，如图 1 所示：首先，新技术产业最先在中心创新城市兴起，外围的创新型城市 1 给中心城市做新技术产业的配套（中心城市位于价值链高端环节、外围城市 1 位于价值链低端环节）；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成熟，该新技术产业逐步移到外围创新城市 1 并在城市 1 兴起，由外围的资本密集型城市 2 给城市 1 做配套（外围城市 1 位于价值链高端环节，外围城市 2 位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然后该技术更成熟，再由外围资本城市 2 转移到外围城市 3……如此，每项新技术的兴起、配套、转移，都基本沿着这一路径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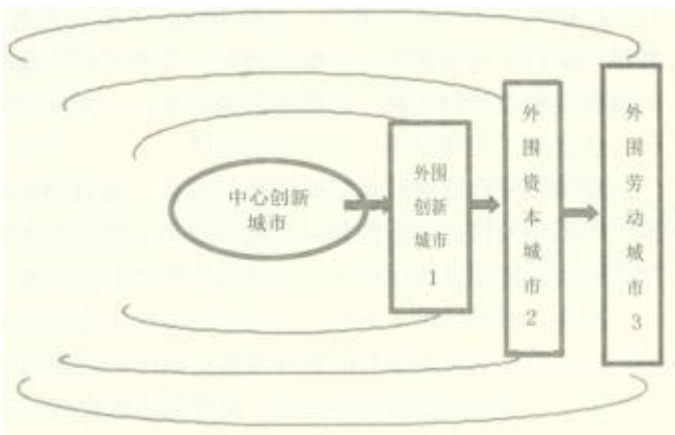


图 1 拓展的“中心-外围”理论：城市群价值链产业分工

由于不断有新技术涌现，中心创新城市不断有新产业兴起，就不断有中心城市和各个层次的外围城市之间动态的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和产业配套，也就形成了一种有先后次序的价值链环节配套、产业配套、专业转移和产业升级。这种城市群中的产业

动态转移，可以实现相互间的动态产业协同效应和价值链协同效应。拓展后的“中心-外围”理论变得动态化，更加符合目前的经济现象，也证明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海、嘉兴、苏州为例，这三个城市处于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阶段：上海是“中心创新城市”，苏州是“外围创新城市”，而嘉兴是“外围资本城市”。三个城市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上呈现阶梯状。城市产业分工的转化过程依次是由制造到智造（制造和智造的融合）、由智造到服务（智造与服务相融合）、由服务到智能服务（服务和智能服务相融合）。上海（中心创新城市）主要位于由服务到智能服务（为主）以及从智造到服务（为辅）两者之间的阶段；苏州（外围创新城市）位于智造到服务的阶段；而嘉兴（外围资本城市）仍位于制造到智造（为主）及智造到服务（为辅）这两者之间。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对接、产业转移实现了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效应、价值链协同效应，促进了各个城市的发展。

三、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分工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的“拓展的‘中心-外围’理论”显示，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结合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现象选取控制变量：经济增长中最传统的来源是生产要素，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尤其是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继而促进经济增长；开放经济是中国最显著的特征，中国经济增长正是得益于外贸的迅速发展。因此，本文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gdp_{it} = \alpha_0 + \alpha_1 ist_{i(t-1)} + \alpha_2 k_{i(t-1)} + \alpha_3 edu_{i(t-1)} + \alpha_4 xm_{i(t-1)} + \mu_{it} \tag{1}$$

其中 gdp_{it} ，是被解释变量，反映城市的经济增长情况，用人均 GDP 表示（取对数处理）； $ist_{i(t-1)}$ 是解释变量，反映产业结构改善情况，用“三产占 GDP 的比重-工业占 GDP 的比重”表示。结合相关理论，选取了人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经济的外向程度为控制变量：人均资本存量 $k_{i(t-1)}$ ，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取对数处理）；人力资本情况 $edu_{i(t-1)}$ 用教育水平表示，选取每万人中高校在校生人数（取对数处理）；经济的外向程度 $xm_{i(t-1)}$ ，用外贸依存度 $\frac{(x+m)}{GDP}$ 其中 x 表示出口、m 表示进口、GDP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选取 1990-2015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上海、苏州、嘉兴三个城市的数据均来自于各自的统计年鉴。另外，考虑到经济增长的滞后性及处理内生性的需要，选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选取的上海、嘉兴、苏州三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邻近，商业习惯、文化习俗相近，也起到了控制作用，使结论更稳健。

对本面板数据进行模型的选择与检验：通过 Hausman 检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序列相关检验、截面相关检验、因此采取了综合处理方法回归。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了逐一添加变量的回归方法，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拓展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的回归结果

项目	回归结果 1	回归结果 2	回归结果 3	回归结果 4
ist	1.19362** (0.46055)	1.06376*** (0.13632)	1.10583*** (0.12857)	1.07159** (0.12721)
k		0.79129*** (0.02500)	0.62478*** (0.05648)	0.61292*** (0.05580)
edu			0.205015* (0.06326)	0.15135* (0.6826)
xm				0.10275 (0.12052)
Con	1.3495***	1.01055***	0.641801***	0.620584***

	(0.092993)	(0.026224)	(0.26922)	(0.26572)
R ²	0.17	0.3293	0.4519	0.5208
F	14.36	22.98	25.53	19.16

注：***、**、*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显著。

从表 2 回归结果 4 来看，实证结果与理论保持一致，产业结构对人均 GDP 的影响为正显著，说明产业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相对发展对城市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均资本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资本深化有利于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反映人力资本情况的高等教育水平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对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提高有促进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反映城市外向经济程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城市的外向经济程度对人均产出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本文选取的三个城市样本都是外向程度很高的城市，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明显；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有巨额的外贸规模，但企业还是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也正是因为处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也就导致无法发挥溢出作用。

四、对策与建议

产业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相对发展对城市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资本深化有利于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对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提高有促进作用。另外，城市经济的外向程度对人均产出有抑制作用。在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建设背景下的嘉兴经济发展，应以产业接轨上海为核心，抓住上海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的机遇，努力提升自身经济实力，使嘉兴经济社会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以产业接轨上海为核心

目前，嘉兴市积极推动各类改革试点，加速对接上海，如成立南湖区和嘉善县省级金融创新示范县（市、区）、秀洲区省级光伏产业“五位一体”创新综合试点等。嘉兴对接上海，产业接轨是核心。

第一，实现产业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嘉兴经济增长。目前，嘉兴市将发展装备制造产业作为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其产品主要涵盖精密机械、光伏电站装备、成套装备、汽车零部件、通信装备等领域。应继续坚持“服务业兴市”战略不动摇，服务业接轨上海是对接上海示范区的重点工作，努力使服务业发展成为嘉兴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第二，在已有的“机器换人”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机器人+”行动（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实现资本深化。应以“机器人”红利替代人口红利，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水平。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国制造 2025 嘉兴行动纲要》中，“机器人+”行动是嘉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点，这一行动将大大促进嘉兴的经济增长。

第三，吸引并留住高素质人才，提高嘉兴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嘉兴经济增长。2017 年，嘉兴市政府颁布了力度较强的 10 条人才新政，应努力把嘉兴打造成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硅谷”。

第四，嘉兴的对外贸易应该由关注“量”的提高转向促进“质”的提升。嘉兴应努力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外向经济层次，真正起到促进嘉兴人均产出增长的效果。结合接轨上海政策，嘉兴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可行做法应该是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品牌知名度和产品特色，一是借助“一带一路”发展跨境电商，培育外贸新业态；二是凭借地理优势培育外贸新动能，构筑更为完善的外贸服务体系。

（二）抓住上海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的机遇

目前，上海正在发展“四新”产业，实现从制造最终向智能服务的转换与融合，伴随着这些转化，制造业、智能制造业、服务业将从上海向外转移；同时，上海亦需要与智能制造、智能服务配套的产业，抓住上海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的机遇就是嘉兴产业发展的机会，在产业对接方面要和苏州拉开梯度形成错位发展。

第一，由制造到智造。嘉兴应该充分利用要素优势和环境优势吸引由上海溢出的先进制造业，和苏州拉开梯度，形成错位发展。在上海以智能机器人推动制造业升级的背景下，嘉兴需要利用这一契机推进“机器人+”行动，依靠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进一步推动工业生产由“制造”向“智造”转变。

第二，智造与智能服务相结合的产业融合。嘉兴应继续消化吸收并升级由上海转移来的制造业，利用上海的智能服务业拉伸嘉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价值链条。一方面夯实嘉兴的智造业，另一方面延长智造业链条长度，起到优化产业结构的效果。

第三，服务到智能服务相融合，尤其是智慧服务与智能服务的产业融合。嘉兴可以成为上海的离岸服务外包供应商，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乌镇这个城市名片，为上海的互联网金融做配套服务，充分认识到服务业的配套发展对嘉兴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意义。

第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领域内积极培育配套上海“新产业”的对接产业。嘉兴的新兴产业、特色优势产业要积极与上海“四新”经济产业配套结合。

第五，打造产业创新基地，依托工业园区、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创意产业集聚区、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推进和打造“新载体”，集聚产业链上下游项目。

第六，推进示范基地、示范项目和示范工程的建设，根据对接上海产业的热点领域，确定产业试点示范基地和示范工程。

[参考文献]:

[1]KRUGMAN. History And Industry Location: The Case of The US Manufacturing Bel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 (2) : 80-83.

[2]KRUGMAN, ELIZONDO. Trade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 Metropol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49 : 137-150.

[3]OVERMAN, LOANNIDES. Cross-Sectional Evolution of The Us City Size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1, 49: 543-566.

[4]PARTRIDGE, et al. Do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gglomeration Shadows Underlie Current Population Dynamics across The Urban Hierarchy ? [J]. Regional Science, 2009, 6: 445-466.

[5]KAHN, VIVES. Why and Where Do Headquarters Move[R]. CEDR Discussion Papers, 2005: 5070 .

[6]吴福象, 沈浩平. 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三角城市群 16 个核心城市的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13 (7) : 89-98.

-
- [7]柴攀峰, 黄中伟. 基于协同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研究[J]. 经济地理, 2014 (6) J5-79.
- [8]王猛, 高波, 樊学瑞. 城市功能专业化的测量和增长效应: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 产业经济研究, 2015 (6) : 42-51.
- [9]孙东琪, 张京祥, 胡毅, 等. 基于产业空间联系的“大都市阴影区”形成机制解析——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研究[J]. 地理科学, 2013 (9) : 1043-1050.
- [10]高丽娜, 朱舜, 李洁, 等. 创新能力、空间依赖与长三角城市群增长核心演化[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5) : 40-44.